

田中阳

主编

刍蕘论丛

刍蕘，割草耘耨者

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漫漫长途中，

「刍蕘」之喻，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传播重要特点的象征，

成为中国传播「去塞求通」特有方式的表征；

仁人志士，为苍生社稷，常常不顾自身之卑贱与安危，

陈「刍蕘之献」；

而开明之统治者，以「天下为公」，

则常常广开言路，「询于刍蕘」



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

——基于文化抗战视角的考察

陈艳辉

著

本书为2021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湖南〈力报〉（1936—1945）与抗战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1YBB230）阶段性成果
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资助项目

田中阳

主编

刍荛论丛

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

——基于文化抗战视角的考察

陈艳辉

著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 / 陈艳辉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9

ISBN 978-7-5561-0530-4

I. ①湖… II. ①陈… III. ①报纸—新闻事业史—湖南省—1936～1945 ②抗日战争—史料—湖南省—1936～1945 IV. ①G219.246.4 ②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6065号

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

著 者 陈艳辉
责任编辑 龙妍洁妮
装帧设计 黎 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宇航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530-4
定 价 38.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主编导言

刳菟，割草采薪者。《诗·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刳菟。”注曰：“刳菟，薪采者。”《淮南子·主术训》：“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刳菟，犹不可弃也。”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漫漫长途，“刳菟”之喻，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传播重要特点的表征，成为中国传播“去塞求通”特有方式的表征：仁人志士，为苍生社稷，常常不顾自身之卑贱与安危，陈“刳菟之献”；而开明之统治者，以“天下为公”，则常常广开言路，“询于刳菟”。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中国走上了艰难坎坷的现代化之途，现代化的历程即是一个“去塞求通”的博弈过程，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成为博弈之器具。它们既可为“刳菟之献”所用，亦可为非难“刳菟之献”所用，既可为“询于刳菟”者所用，也可为妄自尊大者所用。“刳菟”之喻当有新的内涵，然历代仁人志士“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却一直承传下来并发扬光大。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如是说：“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虽蠹蠹之力无取负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谤，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刊1896年《时务报》第一册）表达的就是可贵的“刳菟”精神。戊戌时的“公车上书”，五四时的思想启蒙，“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真理标准”讨论，都是这种见肝

见胆的“刍蕘”精神的发扬光大。

丛书名之“刍蕘”，即著者皆以“虽蠹蠹之力无取负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的精神自勉，彰显的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和使命。建院12年来，学院已出版了7套学术丛书，这7套丛书的出版，展示了学院师资队伍“50后—60后—70后—80后……”前浪引后浪、后浪推前浪的生机勃勃的人才进化景观，展示了学院学术建设从涟漪微起至排浪推进的成长演进的过程，展示了学院学术理念渐趋明朗、定位定向的一个凝练凝集的过程。学院精心打造“书山文化”和“书山氛围”，形成了“读书为本，不同流俗”、“解读传播，求通天下”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学院承续“湖湘学统”，探讨“传播与文化”的本源，以“本土与现代”为运行的双轮双翼，以“经世致用”为治学的目标，以建设中国本土的传播学为职志，永矢勿谖，无敢或贰。在一个空谈清谈之风盛行，附庸附和之气甚上的时代，倡经世致用，倡大本大源，倡“独立之根性”，正是民族本位、天下情怀使然，正是承续湖湘学统使然，也正是“刍蕘”精神的质素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的体现。

本丛书作者的主体是70后、80后的青年教师，他们是“书山”新一代的割草采薪者。他们都是博士。年轻，当是他们的优势，真诚，依是他们的本色，后继有人是我们事业兴旺的标志。仁人志士的人生使命当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尽管青年学者的学术质素和成就还距此遥远，但有此抱负才有远大目标，才有破万卷的恒心，才有成大气候的可能，才有成“一家之言”的学人的境界。作为50后的一名老教师，在学院的发展过程中，做的就是当“人梯”的工作，铺路搭桥的工作。我一直期望几代人一齐努力，在岳麓山下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传播学的一支。莫言说：“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一个句子‘他嗅到了冰的气味’，激发了我的灵感，使我写出了很多篇小说。他虚构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郡，则使我认识到，一个作家，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学地理，建立一个虚构的文学共和国。于是，在我

的小说里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的地理名称。从此，我就像一个演员登上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我就像一个穷小子得到了一把打开宝库的钥匙；写不尽的故事，从文学的高密东北乡像河水一样奔涌而出。”（莫言：《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1期）这是莫言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莫言同时代的作家没有获得如莫言一样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文学如此，学术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学者，一个学术团队都应当有自己的“学术地理”，有自己的“学术共和国”。做学术讲专攻，讲志同道合，讲流派，古往今来都是这样。西方的传播学就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学术共和国”，诸如经验学派、批判学派、格式塔心理学派、哥伦比亚学派、耶鲁学派、施拉姆学派、经济—功能主义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我们的学术受体制所拘，过于功利，过于为稻粱谋，对于学术的宝库奉献太少，不纠正这种荒疏的偏向，能为“圭臬”者寥寥，泡沫破灭后，给我们的还是“荒原”。学院在12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但离其学术目标还很远很远。在这样的体制中，要克服权利与金钱的干扰，要扛住学术的旗帜，绝非易事。但我们还是努力了，也有成功，“前引后推”的人才队列的形成就是一个成功，“乌菟论丛”的出版是又一充满希望的收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乌菟，乌菟，割草采薪，不停歇，仍努力！

田中阳

2013年5月10日于岳麓山寓所

前言

1936年9月15日,《力报》在反日声浪越来越高涨的古城长沙诞生。同时期长沙流行的小报以娱乐为定位,党政机关报以宣传党义为目标,《力报》则以传播、传承文化为宗旨,七七事变后,更以文化抗战为职志。1938年11月,因文夕大火,《力报》被迫停刊。1938年12月15日,长沙《力报》在邵阳复刊,后因与中共有关系而于1940年5月13日被第九战区司令部查封,在此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去桂林于1940年3月10日刊行了《力报》。此后,原力报人再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于1940年7月1日在衡阳出版《力报》,衡阳失守后曾一度到贵阳发行;另一部分人则于1943年6月10日在沅陵刊行《力报》,1945年11月迁回长沙。

《力报》历经磨难,百折不回,但因为初期与复兴社的关系而导致它的价值被遮蔽,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本文以1936.9.15至1945.8.15期间的在湖南境内出版的四份《力报》为研究对象,从文化抗战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归纳分析等方法,力求回到历史情境之中,从报纸的发展变迁、报道、言论、副刊专刊及报人等具体层面切入,系统考察和分析它们是如何为抗战服务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的。

本文首先考察、分析四份《力报》的来龙去脉,梳理彼此之间的关系,着重强调它们共同的宗旨——“文化抗战”。辗转流徙中,力报人都

不曾放弃“力报”这块招牌并一贯坚持最初的宗旨，这缘于他们对新闻事业有着相似的认识并“以报人为终生职业”，更为重要的是对国家、民族同怀深厚的情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因而对《力报》都付出了心血。因此，本文接着分析《力报》同人“以一支秃笔奋战在文化战线上”的精神、思想和践履，并对他们积极参与各救亡团体和身体力行募捐劳军给予肯定。报道和言论是报纸的两大支柱，本文第三和第四部分分析和论述四份《力报》前后相继记录抗战全程，彰显中国军民的协同精神，并通过言论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华文化之认同，凝聚民族抗战精神。副刊则是报纸“发扬文化的园地”，本文最后分析各《力报》在纸张供应减少、印刷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开辟园地，让战时教育、抗战文艺、学术研究等得以传播，使这些文化力量发挥抗战作用。总之，四份《力报》是坚守在文化战线上的抗战尖兵，从报纸本身的发展规律看，它们既有进步性，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1.1 研究缘由	001
1.2 “文化抗战”概念界定	013
1.3 文献综述	021
1.4 研究意义	035
1.5 研究方法与内容	038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040
第二章 《力报》在抗战烽火中始终坚守文化战线	042
2.1 长沙《力报》的创办、发展、中断	042
2.2 邵阳《力报》薪火相继	067
2.3 衡阳“再造《力报》”	074
2.4 沅陵《力报》驰誉湘西	083
2.5 小结	088
第三章 《力报》同人：以文化抗战为职志	092
3.1 “以一支秃笔奋战在文化战线上”	093
3.2 积极参与各文化救亡团体	127

3.3	踊跃参加各项抗战社会工作·····	131
3.4	小结·····	133
第四章	报道：全程、全面记录抗战 彰显中国军民的协同精神 ·····	141
4.1	多视角记录抗战由必然到应然 突出民众支持抗战的坚强 决心·····	142
4.2	记录六次会战 凸显我军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	164
4.3	小结·····	179
第五章	言论：不遗余力宣传文化认同 凝聚民族精神·····	181
5.1	什么是文化认同·····	181
5.2	《力报》对文化认同的宣传 ·····	185
5.3	小结·····	227
第六章	服务于其他文化抗战形式·····	230
6.1	致力于战时社会教育的宣传·····	231
6.2	为抗战文艺提供传播平台·····	249
6.3	用心于介绍战时学术研究·····	276
6.4	小结·····	284
第七章	余论：《力报》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	288
参考文献·····		291
后 记·····		302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缘由

1.1.1 抗战新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1) 研究体例比较单一

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内政外交异常复杂，其中与日本的战争关系持续了14年（以“九一八”为起点）之久，抗日成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议题。新闻传媒在抗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笔者翻阅已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和专著，发现其对这个时期新闻媒介发挥的作用叙述详尽，但体例、着墨也大同小异——体例或者按照国统区、大后方、抗日根据地、沦陷区等抗战区域特色，或者按照新闻事业的性质如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私营的新闻事业进行叙述，笔墨则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重庆、桂林、延安等地域。这种比较单一的编写体例和相对集中的着墨，就很容易忽视其他同样具有价值的地方新闻史。

(2) 研究视角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新闻史的研究，要而言之，主要存在三个视角，

一是阶级分析视角,它突出强调报刊的阶级范畴,遵循阶级主线,在史料处理和结论达成上与阶级观念力求一致;二是本体研究,它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前提之上,主要集中于新闻自身发展规律的梳理与历史分析,以图实现阶级分析与新闻传播自身规律研究的统一;三是现代化视角,它主要将近代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阶段,突出大众传播的现代化本质,研究集中于近代报刊的现代化功能。三种视角各有侧重,但并非完全分离,其缺点也不容忽视。阶级分析视角不仅容易导致历史描述的简单化,也易导致历史评价的模式化。现代化视角则忽略了对传播媒介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特定受众的互动关系研究。^①

既有的新闻史研究对于抗战这一段多运用阶级分析视角,简单化、模式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基本谈不上客观公正。对此,程曼丽曾在《浅析新闻史研究中的“滤色效应”》一文中说,国民党统治时期,它主办和统辖的新闻媒介不下百种(抗战胜利后超过1000家)。而对于这些,我们的新闻史论著大都付之阙如。更为重要的是,对其评价简单化,一概定位为“非主流的”“反主流的”。国民党报刊固然是蒋介石宣传其内外政策的御用工具,然而对国民党不同派系的报刊以及各报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都不能一概而论。她举了两个例子,桂系的两份报纸——《广西日报》和《力报》宣传抗日主张,大量刊登以坚持抗日、反对投降为主题的政治文章及文学作品,对推动抗战起到积极的作用,就连国民党军委直属的反共报纸《扫荡报》在国难当头之时,在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的影响下,也发表过一些比较公正的文章。^②程曼丽认为这种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概念化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是不科学的、不足取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多元的,不能截然二分。^③

① 唐海江:《政治文化视角与近代新闻史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2卷第1期。

② 程曼丽:《浅析新闻史研究中的“滤色效应”》,传媒学术网, <http://academic.medichina.net/article.php?id=3566>, 2010-06-02。

③ 程曼丽:《浅析新闻史研究中的“滤色效应”》,传媒学术网, <http://academic.medichina.net/article.php?id=3566>, 2010-06-02。

（3）研究关注点过于集中

黄旦讲现有的新闻史研究呈现出“谈报纸则只言《申报》《大公报》，论刊物则只看《新青年》《东方杂志》”^①的景况，抗战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更集中体现了这个特点，专著或论文大多集中在大城市中的著名大报上，比如天津的《大公报》，研究成果颇多，而严重忽视同样为抗战鼓与呼的、但相对来说偏安一隅的媒体，研究点过于集中，这就造成了新闻史研究中的“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历史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不是非此即彼。当然，要想在几卷本甚至在一本书当中穷尽所有新闻史料，均匀着墨是不可能的，这就正好为地方新闻史的研究留有余地。笔者认为，对于一个时期新闻媒介的关注与否以及关注的程度应该与这个时期社会的主要问题联系起来，而不是用其他学科研究已经成形的一定的模式（比如革命史）去套。抗战时期，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日抗战，这个时期媒体对抗战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然，“作用”是个中性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媒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以问题带线索，研究会更客观、全面。

基于对现有新闻史研究现状的考察，笔者首先的定位是以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新闻史作为研究对象。

1.1.2 抗战时期的湖南新闻史具有研究价值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素以地灵人杰著称于世，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地区文化。谭其骧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梁启超发出“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②的赞叹。因此，近代以来，湖南在全国的地位显著提高：湖南是湘军的家乡，维新运动最富生气的一省，辛亥武昌起义首应之区，全国农民运动的

① 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② 转引自郭辉东：《湖南人精神与湖南人性格基因探析》，湖湘文化研究会交流论文（2007）。

中心……^①就抗战时期来说,湖南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要拱卫陪都重庆,确保西南抗战根据地,最好的屏障莫过湖南,“南出则连韶之项背可拊,东顾则章赣之肘腋可抚,西下则黔巫之咽喉可塞”。其省会长沙更是“襟要”之地,“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欲向北者,不得长沙,则马首无所托”。因此,保住湖南,就能守住西南大门;失去湖南,就失去西南各省的屏障,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就难以坚持下去。这就是中日双方都以湖南为攻守目标的原因。^②

湖南在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备受学术界关注,对湖南近现代政治、军事、文学的研究非常多,同时催生了一批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成果丰富。但至今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研究湖南新闻史的专著,研究论文也很少。

新闻传播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据现有的史料表明:“湖南新闻事业始于戊戌变法中的《湘学报》和《湘报》。”^③谭嗣同、唐才常既是湖南的维新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湖南新闻事业的开创者。自此以后,湖南的新闻事业在湖南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与全国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关联紧密。

那么,抗战时期湖南的新闻传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历史表明,湖南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而抗战在湖南取得的成绩,离不开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参与,尤其是新闻界的舆论宣传和新闻人的奔走呼号。在整个抗战期间,湖南的报纸绝大部分(“七七事变”后是全部)投入抗战行列。张治中秘书王次青汇编《湘政与舆情》一书,反映当时湖南报界的进步倾向。抗日战争初期,长沙新闻事业的繁荣与进步,仅次于武汉、广

① 《湖南人文历史》,新华网湖南频道, <http://www.hn.xinhuanet.com/news/2001-3-10/01310110912.htm>。

② 李世宇:《张治中治湘与长沙大火》,《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5期。

③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报业》,湖南出版社,1993,第1页。

州。^①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后，衡阳、邵阳、沅陵成为湖南报业中心，影响至邻省。湖南新闻人不仅仅以报纸作为抗战的匕首投枪，同时积极参与到各抗日活动中，比如很多记者、报人加入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在长沙、邵阳、衡阳等地，做了不少有益于抗战的工作。^②因此，笔者认为，抗战时期的湖南新闻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1.3 湖南《力报》具有特殊性

在抗战时期的湖南新闻界，《力报》是一份很特殊的报纸。1936年9月15日，《力报》创刊于长沙，它的办报主体“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黄埔系的蒋肇周、雷锡龄、刘腴深等，分别担任董事、社长等职……另一部分则是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如总编辑康德、记者兼副刊编辑严怪愚、新闻编辑陈楚等”^③。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力报》出版至752期，即迁往湖南邵阳，于1938年12月15日复刊，出版号从753开始。由于得到张治中5000元的资助，张的弟弟的好朋友张稚琴进入邵阳《力报》任经理，雷锡龄、康德仍分别任社长和总编辑，严怪愚任采访部主任兼副刊主编，陈楚任编辑部主任，主笔为欧阳敏讷，后来又增加刘虚、沈光曾两位。

大概半年后，张稚琴带一部分力报人到桂林，筹备出版《力报》（1940年3月10日正式出刊）。由于人事发生变动，邵阳《力报》着手改革，将社长制改为经理制，由康德任总经理，严怪愚任总编辑，陈楚任副总编辑，侯佩璜任副刊编辑，后来邀冯英子任主笔兼采访部主任，主笔还有唐旭之。侯、唐都为中共地下党员。出版至1252期，邵阳《力报》被

^①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报业》，湖南出版社，1993，第6页。

^② 陈艳辉：《论抗战时期湖南新闻传播对抗战的影响》，《湖湘论坛》，2012第4期。

^③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报业》，湖南出版社，1993，第156—157页。

第九战区司令部于1940年5月13日查封。

邵阳《力报》被查封后，雷锡龄带一部分力报人到衡阳，于1940年7月1日出版《力报》，雷任社长，戴哲明任总经理，李幻如任总编辑，汤继成为经理，报纸从第1号开始。

1943年6月10日，原邵阳《力报》的另一部分人则在沅陵出版《力报》，由沅陵税务局局长李宗理出资，由原长沙《力报》的经理朱德龄任发行人，严怪愚、冯英子负责编务。他们声称是邵阳《力报》的复刊，出版也从第1号开始。

至此，“《力报》由长沙一家衍变为邵阳、桂林、衡阳、沅陵四家”^①。所以当时青年学生们唱：“《力报》《力报》，多如牛毛；那（笔者注：应该是哪）家算坏，那家算好；彼苍天者，我不知道！”^②在湖南新闻史上，《力报》有长沙、邵阳、衡阳、沅陵四家。为什么说它们很特殊呢？

第一，抗战期间辗转迁徙的报纸有很多，但没有如《力报》这般关系复杂的。抗战全面爆发后，报刊的迁徙情况大概分为3种：第一种是在迁徙过程中新出版了报纸，但新出版的属地方版，构成一个报系，比如《中央日报》，在抗战时期曾经先后出版过长沙、贵州、昆明、广西、湖南、成都、福建、福州、安徽、芷江（贵阳版的分版）、屯溪等10多个分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央日报》系统。《大公报》也是首先在天津创业，继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版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香港版。其他还有《民国日报》《中山日报》《扫荡报》《阵中日报》和《扫荡简报》等。第二种是停刊后再复刊，如《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上海，1941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扼杀。三年半经历了三个时期：上海时期（1937年8月24日—11月22日），广州时期（1938年1月1日—10月21日）和桂林时期（1939年1月10日—1941年2月28日）。又如《新

① 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二十卷·新闻出版志·报业》，湖南出版社，1993，第157页。

② 严怪愚：《严怪愚文集》，岳麓书社，1997，第334页。

民报》1929年创刊于南京，1938年1月15日于重庆复刊^①；《大刚报》1937年11月9日正式在郑州创刊，日寇南侵，1938年5月31日搬迁，6月8日在信阳复刊，1938年8月底信阳告急，1938年8月18日暂行停刊，1939年11月1日在衡阳正式复刊，后《大刚报》又从衡阳撤到柳州，于1944年7月10日复刊，再次被迫迁走，1944年10月15日在贵阳复刊。^②其他还有《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于汉口正式出版，10月24日撤离武汉，25日继续在重庆出版，等等。第三种情况是，被迫停刊后，继续出版，但报名更改了，跟原报没有任何关系。如上海的《译报》，1937年12月9日由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创办，12月20日即被迫停刊，1938年1月21日，改名《每日译报》。

《力报》与上述报纸都不一样，四个地方出版的既不是总报馆与地方版的关系，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复刊，但它们之间又确实有承接关系。冯英子也肯定地说：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各个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里，先后出过六家《力报》（注：六家是指长沙、邵阳、衡阳、沅陵、桂林及衡阳沦陷后衡阳《力报》曾在贵阳出版过一段时期），这六家《力报》，既各自独立而又有一定的关系。^③

在湖南境内出版的四份，其具体情况是：邵阳《力报》完全是长沙《力报》的复刊，衡阳《力报》一再声明自己是长沙《力报》、邵阳《力报》的承接，比如在一周年纪念刊上，社长雷锡龄在《本报到衡一年》中说：“本报自长沙产生以及到衡阳出版，前后五六年。”衡阳《力报》其他同仁也一致认同这一点，邵阳《力报》未完成的报纸送达任务也由它代为完成，但事实上，从形式上说，衡阳《力报》并未承续邵阳《力报》的出版号，同时，总经理戴哲明说：“本来名称是一个，可是三个版的人事经

① 作者参看各中国新闻史教材总结而得。

② 李理：《从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到共产党的党报——汉口〈大刚报〉史研究（1945.11—1951.12）》，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1。

③ 冯英子：《关于桂林〈力报〉的评价问题》，《黄河》，1994年第4期。